

汪润琳《红腰带》：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彩长卷

□贾平凹

《红腰带》这本书我看了以后非常兴奋。这是一部大气、厚重的作品，时间跨度长，人物众多，写了几个家族的沉浮，这种题材是比较难以驾驭的，因为几个家族的沉浮，必须涉及那个时代的人物、风情、地理以及文化；更重要的是，作家要通过这些故事和人物表达出自己的观念及洞见，这一点确实是很难的，不仅是写过去发生的事情、历史事件，更是要传达作者自己的文学观、世界观和对过去那段历史的看法。作者在具体写作时要收集很多材料，要有结构几十万字的能力，而且还要把文学观念从文章中表达出来。《红腰带》这部作品，作者占有的材料丰富、知识充足。读完这部作品之后，我深深感到作者汪润琳有着成熟的写作经验。他把材料应用得非常丰富。所以总的来说，这是一部优秀的作品。这是我对这部作品整体的概念和印象。

陕西作家的作品多涉及民风民俗的方面，《红腰带》也是延续了这种文学传统，但是它又有了新的发展。痛快——这是我读这部作品时的感受。它的文字酣畅淋漓，文笔讲

究，70万字的作品，生活气息浓烈，足以看到这个作家对这段历史，对中原一带的地理、风情、文化的研究非常深入，表现力很强，显得不卑不亢。尤其是前半部分，我读时感到很吃惊也很兴奋，时不时让我想起以前看过的一本老书叫《新儿女英雄传》，那种叙事方法、语言及细节描写和节奏，看后令人兴奋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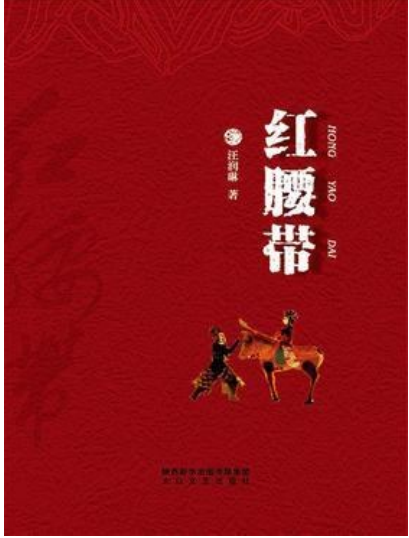
《红腰带》整个语言具有弹性，充满了写作的激情，而且文字里有智慧，能感到作者写得激情洋溢，那种像水一样漫过来的激情，特别有意思，作家写得得意了才华就表现出来了。这种叙事角度和语言表现，容易被各个阶层的读者接受。现在很多作品往往是写给一部分读者看的，就像粤菜适宜南方人，川菜适应爱辣的人吃，写作也是这样。但是，《红腰带》这本书作者采取这种写法所达到的效果，让能看门道的人看门道，喜欢看热闹的人看热闹，从各个角度进入，我觉得这是这部作品特别好看的一点。

再者，这部作品对地方风俗、风情的描写，表现得特别畅快，把地理、风俗和文学的

关系处理得特别恰当。这些民俗、风俗也为这部作品增加了色彩。当时我看这部作品的时候，不仅是传奇故事，还有各种文化的碰撞，事件与事件之间都充满了风情、民情和地理的描写，这更容易使人解读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这本书不仅是讲述一个故事，更能使人从这个故事里理解中华文化的优秀传承。

全书人物的塑造很成功。书中写到的事件及人物，在当地都有生活原型，很多故事都是曾经发生在陕西大地上的。但作者把历史故事转化成了文字，把现实生活中的原型转化进入了自己的文学。《红腰带》不是硬写，不是把历史事件硬加进来的。姬耀先、姜阴阳、胡老七这些人物都很有立体感。当然，作家写正面的形象比较容易，而不是正面的人物就特别费力，而作者写的反面人物也很精彩。而且，整个故事大开大合，全书人物都非常传奇。

这本书写得有激情、有智慧、特别有味道，但也有一些不足，一是结构上胡老七开



头闪了一下，后面出现的间隔时间太久；二是风俗描写太多，要精练一些；三是语言还要涩一些。

一座村庄的复活

——评彭东明的长篇小说《坪上村传》 □舒文治

给自己的村庄立传，是一个很妙的想法，也会是一次完成精神建国的挑战，需要发下宏愿、打开记忆、激活想象、身心重归，也需要视野的阔大、内部的敞开、深入而不一味沉湎，真实而不拘泥实录——以这些维度来度量，彭东明的《坪上村传》给我们提供了“传”所要求的历史的纵深、现实的鲜活、细处的丰饶、形象的群雕、情感的咏叹以及文化留下的厚积。彭东明笔下的坪上村便是一处多重叠加的场域，它是地理坐标上的虚实画线，是家族史和村历史的想象性留存，是个人重新进入历史的满载而归，在这层意义的拓展上，也是个人的成长史；同时，它又是地方性知识的有趣集锦，是一幅幅风俗画、风景画和人物画裱成的连轴长卷。书中，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写实的、传奇的、图集的、审美的、人格化的坪上村，自然而然，我们也看到了给村庄立传的彭东明，他出入故乡仿佛是为了完成一个宿命，将坪上村立体地呈现，建立起坪上村人物长廊和旧物博物馆，四周栽种自己生命里最值得眷恋和体味的记忆树。由于记忆的神奇功能，他写出一场皆历历在目，再也不会被遗忘，而且植出一大片繁茂的记忆树，又变成了丰林园，此处，他便和故园共在、永存。

如此被复活的村庄不会颓败，它超乎地理空间，是精神的存在物，既可以对抗遗忘，也可以生殖意义。

彭东明进入、重构、复活坪上村走的是他的个人之路，用的是他的个人之法。“离开村庄的时候，我似乎已经下定了决心，我要回来修缮这栋残存的老屋。”这句提示了进入一个村庄的路径，却并没有揭开内心需要的答案。整部小说都是为这个内心需求而铺设，但直到最后，答案仍然没有明示，正因为没有明示，小说的魅力才得以增添而不是衰减，其多重意义才可以被阐释和延伸。“我也不知道要在这里寻找什么。”这句全书之问不但是一个游子的深切之问，也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回避的一大困惑，可以表述为：何处可以找到、安顿我们的精神家园，我们到底需要什么。后一个问题比前一个问题的内涵和外延还要深远，对这类心灵之感，任何指导性的、自以为是的宏词大都会显得空洞，导致意义虚化。特别对于小说作者，个人之困、个人之路和个人之法三者必须通过体察、求索和写作实践来一一细究，一步步走过，然后显现于整体性文本，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都不能空转和替代，这样，才是一种及物的、有体温的、接地气的、诚实的写作。彭东明奉行的是这种写作伦理。祖屋的修缮可以理解成为一种意蕴溢出的象征，是个人精神坐标上的重大事件，“我”历经38年后，终于可以安定下来和家乡深度对话，并将家乡从忘川和溃散中抢救出来，家乡在“我”记忆术的创造下获得了文本意义上的再生，“我”亦被家乡重新塑造。

从文本形态的分类来看，《坪上村传》也有自身的特质，它虽是小说，却跨文本，跨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到底是虚构的成分多还是非虚构的成分多，据据得出的意义不会太大，而文本比较可能会生出别致的意义，据我的阅读经验，可与梁鸿那两本引起了很大反响的书《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来比读。两

者（特别是与《中国在梁庄》比读）在情绪投入形成的底色上、在叙述调门上、在文本的跨度上、在对中国乡村的建构模式上，都有可比之处。梁鸿的追求是，“我希望能把‘我’和‘梁庄内部’之间真正弥合，并创造一种新的文体。文学并无定法，关键在于你能否使你的框架具有张力并最终变成一种可供叙说的新文体。”在这个契合度上，《坪上村传》所采用的人物和事件单列、并置的结构法看似不讲究章法，却是自由开合的、散点透视的、方便叙说的，因而而形成了一定的“扩张和敞开”。最难能可贵的是，梁鸿和彭东明都不约而同采用了“故乡深入法”，他们进入，走访，住下来，沉下去，心与心贴近，尽可能挖掘出被多重遮蔽的乡土秘密，看到家乡历史和现实更多的交织，那些浑然一体，那些“生命的存在样态”，那些深处的包容，是无边现实主义所产生的“井喷”；比起很多作家书房里的虚构，他们的方式确实能够把“丰富、细微和独我的存在”锁定于真实感之中，因而给读者带来阅读上更多的质感、动感和信任感。另一组有意味的比较是，梁鸿也写到了她家的老屋，一样的荒凉、废弃了，虽承载着她的成长、情感和生活，但她一直不敢动它，不愿在里面多待，对它和整个梁庄的悄然溃败无能为力，因而梁鸿对家乡的情愫一直是哀痛的、“呼愁”的，更多的是质疑和反思，以至她对自己进入故乡的行为也深表疑虑：“或者说，我从来都没有真正进入过梁庄。我指的是，它的结构和它的命运。”而彭东明对老屋，是一个行动者在修复，是主体性的继承，是一种男子汉风格的重新入住，他对故乡，虽也乡愁浓郁、困惑颇多，但更多的是回味、欣赏、美图，他重建的信心满满，努力正付诸行动，而家乡更加美好的未来可期。我要比较的不是这两种方式哪个更优越，而是要用各自的唯一方式来回应梁鸿提出的根本性问题：“以何种方式建构村庄”。对彭东明而言，他审美后的坪上村已经重建，他个人的精神家园得以修复，他与坪上村其未来的生活安排触手可及，他正以行动的自觉和持续付出来参与中国新一轮乡村振兴实践。在此意义上，他提供了一种行动方式，克服了知识分子在复杂多变的现实面前的胆怯、迟疑和裹足不前。梁鸿深入剖析过自己也是她那个群体的精神特质：“我们着迷于叙事和文本本身，并不真正关心真实的世界。”这种方式本身也应该成为反省的对象，没有反省，就没有坚定的实践理性和清晰的实践路径，文本意义终究不过是一团纸上烟云。夸夸其谈的文本主义者难道不应该跨出他们最迫切的一步吗？梁鸿已经在行动，她一直在深省中寻找建构，她有她的“罗陀斯”，但她太多的顾忌也在消减她的建构力。

而通过满是自己体温、感觉的文字和叙述来复活一个村庄，与之愈来愈亲近，并在个人深度和时代意义上与之叠合为休戚与共的共存体——彭东明和《坪上村传》为我们贡献的不仅是一个多彩的文本，更是一种深入故乡、建构村庄的行为能力。立传，是与史诗相并列的最高级别的文化再造，为乡土立传，便是乡土文学的最高表现，但愿不要简化和固化它的意义，因为故土也就意味着生命绵延和可以无限敞开。

《王蒙论》以时间为线索，以王蒙各个阶段的代表性作品为中心，进行了一番细致入微的重新解读。比如对20世纪50年代书写的《青春万岁》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两部作品，王春林都带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写于60多年前的《青春万岁》之所以直到今天仍然魅力不减，主要在于书写对象、书写主体、社会形态三位一体的青春体验的真实性，使写作溢出单一意识形态框定的圈圈，不自觉地触及了生命本身的永恒母题：青春的迷茫与忧伤。《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则是“现实批判、浪漫书写、人性循环”的组合，而这一切的感觉，都来自于文本的细致阅读，都是从文本细节中自然而然地合情合理地得出来的。例如对王清泉这一人物的分析，王春林指出，王清泉被指认为官僚主义，起码是有误读的。从小说细节中，王清泉的问题主要是只知埋头拉车，不知抬头看路的问题。于是，王春林认为，王蒙在有意无意之间溢出时代意识形态框限的同时，却也触摸到了政治意识形态理论务虚与经济生产效益之间一种隐在的矛盾冲突。

最为精彩的是王春林对《活动变人形》的解读。关于《活动变人形》研究已有很多成果，大部分的观点是“审父意识”，不过这一“审父意识”审的是什么语焉不详。作者认为，从主题意蕴上看，《活动变人形》具有双重文化批判主题。“所谓双重文化批判主题，其第一重是指对西方文化影响的现代启蒙知识分子的文化批判，这一重主题集中通过倪晋诚这一人物形象体现出来。其第二重，则是指对带有明显封建色彩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批判，这一重主题，集中通过姜氏母女三人体现出来，其中最代表性的一位人物，乃是倪晋诚的妻姐姜静珍。”我觉得，作者发现的王蒙“审父”是作为革命者的儿辈倪藻对作为启蒙知识分子一代的父的“审视”的观点，具有重要的意义。不过，作者说：“王蒙站在革命知识分子立场，毫不犹豫地宣布了启蒙知识分子倪晋诚的死刑。”春林认为这对于小说思想艺术深度是一种伤害。对于这样一个观点，我是持保留意见的。我觉得，作者把倪藻的视点完全等同于王蒙是不完全正确的，实际上，在倪藻之外，还有一个作者即王蒙的视点，王蒙不仅在审视倪晋诚、姜氏母女及赵尚同，也在“审己”——倪藻和自己所认同的“革命”，也就是三重审视：反思启蒙、反思传统，也反思革命。王蒙既肯定了启蒙的必要性，也反省了启蒙的理想化与空幻性；王蒙既肯定了革命的必然性，同时也反省了革命之后的极端性带来的问题。王蒙讲述的故事虽然是个老年间的故事，但王蒙讲述故事的年代却是在80年代。80年代中期，当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被普遍接受，当启蒙变得神圣无可怀疑，而革命的必然性和正当性却遭到一定程度怀疑的时候，王蒙的这种反思，就显得异乎寻常，这难道不是《活动变人形》的思想艺术深度的体现吗？无论如何，我对作者提出的问题 and 发现是颇感兴趣的。在《王蒙论》中，作者较真的地方很多，比如“组织部三轮车夫不要钱”的问题，“苏宁举报父亲而遭受毒打”的问题等等，我很欣赏这种较真的精神，这是一种求真务实，是一个好的批评家应具备的品格。求真意志，是说一个好的批评家必须秉持自己敏锐的判断力，不随波逐流，要大胆说出自己内心的声音，不管这种声音是否会引起各种各样的争议和反对。我认为作者的文学批评基本属于感悟式批评，这是有深度的感悟，这种深度在于他对作品全身心的生命体验的投射。王春林的文学评论是及物的评论，是保有激情的“我”的“感悟”。将“自我”的生命体验投入作品，使得作者的批评文字饱满而坚硬。

《王蒙论》虽然是一种个案研究，但也充分显示了作者写史的意识自觉。这与他长期以来对当代作家作品的追踪式的批评有关。比如1987年作者就开始了对王蒙的文学批评，王春林追踪研究有关王蒙小说的评论就有十几篇之多，可见，这种研究是有着充分准备的。王春林用史的眼光前瞻后顾，因而使批评视野开阔，言之有据。在第十一章《“说出复杂性”的“反现代化叙事”——以《青狐》为中心》，作者不断地把《青狐》与“四个季节”系列小说进行对比，认为王蒙“衰年变法”是试图超越“季节系列”小说艺术方式的不断探索精神的体现，并认为《青狐》在结构上超越了“四个季节”系列小说的单一结构，而变为复线结构。作者认为王蒙在80年代的创作，属于现代化的宏大叙事，而到了《青狐》，王蒙的创作演化为了“反现代化叙事”，王春林说：“如果说，1980年代的王蒙的确是一位真诚热情的‘现代化叙事’者，那么，也可以说，王蒙是在经历了差不多20多年的人生经验的震荡与冲击之后，在经历了20多年痛苦与欣悦相伴相随的艰难曲折的思想历程之后，才最终走向了以怀疑否定为基本特征的一种‘反现代化叙事’的。”

我说王春林具有史的意识的第二重意思，是指这部专著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始终把王蒙及其创作历史化。比如对《蝴蝶》有关海云人物原型——孙丽生的考证，就有点历史索隐的意思。在谈到《活动变人形》的章节中，王春林把这部小说的发生，放置在80年代中期的文化寻根思潮中来考察，并对其中的“父—子”冲突模式追溯到“五四新文学”的历史长河中来比较，就十分清楚地显露出王蒙小说的文学史定位。王春林就是这样，纵横捭阖，以不争的史实，证明了“王蒙确实是当代中国文坛少见的取得了多方面成就的杰出作家。如果以一种比喻性的说法来表达的话，那么，我想说，王蒙是个海，一位具有极大包容性的如同海一样广阔的作家。……王蒙的多方面的文学成就，是当代的其他作家所难以比肩的。”当然，作者在史的比较中，也发现了王蒙的局限性，比如对《闷与狂》中“精神犬儒”的批评，对王蒙晚年文化心态的分析，认为王蒙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与追捧，是远离了知识分子的现代启蒙精神等。尽管这些结论还有过分武断之嫌，但敢于说出自己内心的声音的这种精神还是难能可贵的。

在20世纪后半叶的当代诗人群中，高深无疑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位亲历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战士，这位将自己青春生命献给了大时代的诗人，以他高亢深沉的诗歌，崇高壮丽的诗美，歌唱祖国、歌唱人民，先后出版了《大西北放歌》等十多部诗集，为当代诗歌的发展，作出了自己宝贵的贡献。

歌颂祖国天翻地覆的变化，歌颂工人阶级崇高的献身精神，是高深诗歌的鲜明特色。大时代赋予了诗人高深非凡的生命体验。他11岁就投入了战争的炮火硝烟，参加过辽沈、平津、衡宝等战役，从东北一直打到湖南。戎马关山的军旅生涯，枪林弹雨的战斗经历，磨练了他的意志品质，铸造了他的浓烈诗情，决定了他将永远不倦地为祖国和人民歌唱。他献身革命的铮铮硬骨，忠于人民的耿耿丹心，以及诗歌创作的基因，无不与此血与火交织的历史有关。因此，转业到沈阳之后，他立刻投入了对新生活的礼赞，沉浸在翻身喜悦和解放欢乐之中的年轻诗人，对自己抛洒血汗取得的胜利硕果格外珍爱。在他的笔下，一草一木皆为美，万水千山总是情。《海兰江，你是革命的摇篮》《布尔哈通河畔》《弯曲的嘎呀河呀》《铁鹰》《走向沸腾的生活》《车间颂》等诗歌在当时都广有影响。有些作品，即使是在经过历史风雨剥蚀后的今天，仍然闪烁着诗美的光彩异彩。值得重视的是，高深对当代工业诗歌的开拓和建设也功不可没。在共和国最早的工业诗歌中，同部燕祥等一起，就有高深清新质朴的迷人歌声。在烟囱如林的铁西区，在马达轰鸣的机床厂，这位年轻的老革命，刚洗尽硝烟征尘，便迷醉于机油的沁人芬芳，刚放下铮亮的枪杆，便发出了对机床的热情歌唱。他的诗歌不但推出了金色阳光下生气勃勃的东北工业基地大写真，而且勾画了风发鼙鼓的工人阶级群体形象。可以认定，高深本时期诗歌创作的鲜明站位，即努力描绘为共和国大厦奠定基础的东北工业基地，努力刻绘工人阶级社会主义建设主力军的形象，无疑表现了他对党和人民的无限热爱之情。

深沉地思考时代历史命运，热情地讴歌伟大的改革开放，是高深诗歌最响亮的音符。上世纪70年代末期，思想解放的先潮涌起，归来的高深来不及抚摩自己身上的伤痕，就吟唱起归来的歌。不过，他的歌声不是对自己命运的伤悼，不是对往事如烟的感叹，而是对时代历史、民族前途的深沉思考，对改革开放、中华腾飞的热情呼唤。面对“文革”带给中国人民的巨大灾难，面对封建法西斯对人性的无情蹂躏，他认真地反思历史，呼唤改革，以他的黄钟大吕之音，作出了关于民主、法律问题的艺术发言。《假话》《民主》《法律》《记忆》等诗歌就揭示了这样严峻的主题。他愤怒谴责践踏法律、假话成风的不良现象。他热情欢呼“归来了，一别多年的社会主义民主，广开言路的花朵，果实将是人才辈出。人们渴望你落户，有了你才有丰富的布帛菽粟，少一‘点’就可能饿掉一个民族”。也许，这样的诗歌在今天不足为奇，然而，“那是一种勇敢的、真诚的对于时代的责任、追求的呐喊”。

以浓烈的人民意识来观照生活，以深情的笔墨宣泄百姓精神诉求，是高深诗歌的母题。出身于贫寒和回族的高深，有着与生俱来的人民意识和民间情怀。为了改变阶级和民族的命运，他奉献了战火中的童年和青春。即使命运巨变，人生腾达，他也不改初衷。他说：“平民意识是我诗歌写作的灵魂……我的知己是普通人。”上个世纪80年代，复出不久的诗人立刻就将浓烈的诗情聚焦到与他相濡以沫的劳动群众身上了。他写闯过千涛万浪的黄河筏子工：“他是惊涛骇浪养育成的人/那裂岸的浪涛给他拼搏的享

诗情，在大时代的风雨中升腾

——对诗人高深诗美的探析

□郑丽娜

受”；他写同孤独结下缘分的牧羊人：“他觉得很自由自由得让人苦闷”，“眼角像鞭子一样冷峻”；他写守着黄泥小屋的女店主：“美貌中透着几分野性”，“哼着‘花儿’去寻觅失落太早的青春”。在他的诗歌中，走出了缄默中的老羊工，发辫长长的葡萄女，揣着儿时梦幻的老泥水匠，纺羊毛线的纺织女工……“这些人的经历充满了漂泊、传奇、磨难，贫困中张扬着自由和悲壮”，不愧为我们民族的柱石和脊梁。

开掘中华民族精神的底蕴，彰显中华民族性格的精髓，是高深诗歌强烈的精神表征。作为回族诗人的高深，他挚爱自己的民族，无论是在民族散居地的大东北，还是在自己民族故乡的大西北，他都向自己的民族献上了许多动人的诗章。《大西北放歌》是其中的典型之作，《回族人家》《关于我的民族》《题马骏墓》《我默立在海瑞墓前》是其中的代表作。在《回族人家》中，诗人是这样抒写自己民族的：“你分享过伟大母亲的骄傲和光荣，也同母亲一起经受内忧外患的折磨。你和五十五个兄弟协力砸碎黑夜，五星红旗上也染着你的几滴鲜血。”《我默立在海瑞墓前》，诗人写道：“不是因为你是回/我才对你特别敬爱/因为你给回回民族/留下了为官的清白/不是因为你是清官/我才对你特别崇拜/因为你给中华民族/留下了由衷的信赖”。值得注意的是，高深是自觉地站在时代高度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立场上，以现代人的眼光来审视自己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实现了“民族现代化、民族精神与现代意识在更高层次上的有机结合”。这在回族和少数民族诗人中，无疑是成功的个案。

抒写革命的战斗精神，剖白不忘初心的战士心态，是高深诗歌审美意义的显著特点。表现出强烈的革命本色。几十年的诗歌创作道路表明，高深从来也没有忘记过战士的责任，从来没有停止过战斗的歌唱。《一曲不寻常的战争壮歌》《决战之前的雪夜》《塑像》《朱瑞将军》《总攻前在指挥所》《他战死在那个遥远的冬天》等一大批诗歌都是书写峥嵘岁月、张扬革命精神的。在锦州城，他缅怀着那个遥远冬天的黎明，在雨花台，他诠释着烈士给世界留下的美梦，在义州镇，他回忆着炮兵之父悲壮的灵魂……从这些诗歌中，我们看到了诗人忠贞的信念和烈火般的真情。

高深的诗歌在艺术上获得了很高的成就。其主要特色是，第一，继承诗歌言志的传统，他的诗歌洋溢着浓烈的真情。他以广阔的艺术视野，观照着大千世界和人间万象，以诗般的艺术思维，思考着社会和人生。无论是回望历史，还是观察当下，无论是直抒胸臆，还是隐露心曲，他的诗歌都充满了真情、挚情、热情、豪情。第二，弘扬西部诗歌的精髓，他的诗歌喷薄着豪放和苍凉。高深把青春献给了贺兰山和宁夏川，他深爱那苍茫、浑厚而又荒凉、凝滞的大西北，深爱那淳朴、豪壮而又雄浑、坚毅的西北人。大西北给了他艺术的震撼和启迪，给了他大漠和黄河的语言，给了他苍鹰、瀚海、胡杨、驼铃的意象，使他的诗歌世界充满了旷放、豪迈、悲怆和阳刚。第三，追求立意的新颖独到，他的诗歌熔铸着深邃的哲理。坎坷的人生经历，丰富的艺术素养，使他青睐艺术哲思。他写出了许多为人击节、啧啧称奇的哲理诗，诗中都或多或少、或浓或淡地阐发着哲理。诗思、哲思凝聚为哲理美，成了他诗歌亮丽的风景线。他从生活的心灵视野中寻觅哲理，从情景交融的意境中升华哲理，从多种手法的融会中显示哲理，让他的诗歌如天风海山，气象万千。

高深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诗歌永远留在当代诗歌的百花园。让我们在社会主义新时代，像他那样，为祖国为人民为中华民族的中国梦，不倦地歌唱，为人民献上壮美的诗篇。